

台，水声波影上的戏韵，更见风流蕴藉。作为传统戏曲的载体，戏台联系着我国古代多种多样的宗教习俗和戏曲民俗，负载着传统戏曲的艺术形态和观演关系，乃至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。运河上的古戏台，无疑是见证我国戏曲艺术产生、发展和走向辉煌的宝贵实物。

毋庸置疑，大运河畔的古戏台是源远流长的中国戏剧舞台的活标本，它是研究中国戏剧史、剧场史的活标本，是“固态的戏剧文化”。鲁迅先生的《社戏》中有如下一段描写：“最惹眼的是屹立在庄外临河的空地上的一座戏台，模糊在远处的月夜中，和空间几乎分不出界限，我疑心画上见过的仙境，就在这里出现了。”这种临河空地上“仙境”般的演艺夜景，或许每一个绍兴人都不陌生。明清以来，绍兴戏曲声腔繁盛，民间戏班穿梭于阡陌市井，香市、神诞、会市终年不断，城乡不仅广建精构的“万年台”，而且还在晒场、空地因时因地加建临时的“草台”。繁盛的戏曲声腔艺术，不仅活跃了城乡的经济生活，更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。

绍兴的地方戏，正是在水路传播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。越剧始于清同治年间，嵊县农村出现落地唱书，以四工合调说唱短篇农村故事，很快流行当地并逐渐传至杭嘉湖一带形成长于叙事的新调（吟哦调），开始说唱长本书。光绪三十年（1906）春节期间，嵊县农村艺人首次化妆登台，演出《赖婚记》等剧目，因只用笃鼓、檀板按拍击节，的笃之声不断，故称“的笃板”或“小歌班”，渐次衍变为一种地方戏曲，并流行于绍兴、宁波一带。男班文戏进入全盛时期，之后又出现了文戏女子科班。此后，女子戏班林立，称为绍兴女子戏，简称女子文戏。

昆曲《牡丹亭》。



在谢晋导演的电影《舞台姐妹》中，有一个极为经典的镜头——长长的运河，蜿蜒的板桥，越剧戏班沿着大运河一带辛苦地卖唱，耳边久久地回荡着歌声：“年年难唱年年唱，处处无家处处家……愿将清泉洗双目，远望前途花似锦。莫道乌篷破浪过，前面尚有万里行。”正是顺着大运河的水，女子越剧走出了曹娥江，融入了黄浦江，并在今后的岁月中，拥抱时代，成就了“中国第二大剧种”——越剧。

还有享有“百戏之祖”美誉的昆曲，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第一批“人类口述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”榜首，昆曲正产生在运河岸边的昆山、苏州一代。据考证，昆山腔出现并逐渐演变成著名声腔，除了自宋元以来江南一代有较好的戏曲传统这个因素外，还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：一是运河的因素，因临近运河，苏州成为南北戏曲、音乐的交汇点；二是欣赏与创作群体的因素，因经济、贸易的发达与繁荣，苏州成为富庶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。这些人群中，尤其是士大夫与文人们，对戏曲有更高、更艺术化的要求，他们成为昆山腔的重要观众来源及改革的坚定支持者。以此为基础，魏良辅等人才走上了改革昆山腔的道路。他们借鉴各地戏曲艺术，对传统昆山腔的声腔、歌唱、伴奏等进行了广泛改革，使得昆山腔由“率平直无意致”（余怀《寄畅园闻歌记》）的“讹陋”声腔，变成了“清柔而婉折”的艺术（顾起元《客座赘语》卷九）。这是一条提高与雅化的道路。正是由于这种改革，才使得昆山腔由一种只限于吴中一隅的声腔，迅速扩大了影响，最终成为“四方歌者皆宗吴门”（徐树丕《识小录》）的居诸腔之冠的剧种。

梅葆玖（右）是梅兰芳的儿子，梅派艺术传人，代表作有《霸王别姬》《贵妃醉酒》等。

